

“双师型”教师建设 难转身,谁之过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安徽某地方本科院校新闻学教师小周最近总在为学生的就业前景忧心不已。临近毕业,新闻学专业大多数学生找的是营销类岗位,去媒体的毕业生寥寥无几,还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没有着落。其主要原因是,“找工作拼不过‘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毕业生”。

在就业率的倒逼下,像小周所在的这类院校已经开始向应用技术方向转型,培养区别于“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的实践型人才。然而,大学里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的理论型教师,想要教出有实践技能的学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小周的学校反复强调要促使教师队伍向实践型方向调整,鼓励教师们向“双师型”教师发展。但该怎么做,学校也是一头雾水。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中国大学评论

开放异地高考与遏制高考移民应并行不悖

熊丙奇

马上就要高考了,湖北黄冈中学高三学生黄涛(化名)却还没能报上名。出于异地高考政策原因,他既不能在就读的湖北参加高考,又无法在户籍和学籍所在地内蒙古参加高考。5月26日,黄涛父亲委托律师递交行政起诉状,状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侵害了儿子接受教育、入学、升学的权利。相关部门回应称,黄涛不符合当地报考条件,但出于人性化考虑,仍在积极“补救”。在“异地高考”破冰但各地政策不一的大背景下,黄涛的命运值得教育主管部门和全社会关注。

对于黄涛同学的高考命运,舆论颇为纠结。一方面,他不能报名高考,令人同情;而另一方面,他这类情况与此前曝光出的其他无法报名的学生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本人在内蒙古有户籍、学籍,双证齐全,只是学籍属于“空挂”性质,因未能满足当地制定的高考报名条件而不能报考。这种情况在很多人看来是典型的“高考移民”——把学籍挂在教育质量不高的地区,再到教育质量高的地区求学,高考时再回户籍和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对此,还有网友赞成要严厉打击。

地方政府从维护高考公平出发打击“高考移民”,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包括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同时给受教育者适应期。在国外,一项新的教育政策出台,至少要给民众3到5年的适应期;而且一旦出台,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作为基本的民生政策,教育政策影响广泛,不能随意出台,马上执行。我国教育部门也提出了3年早知道的出台教育政策规范。

据报道,为了遏制“高考移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3年结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政策,修订了相关高考报名资格政策。新政策规定,截止到2014年4月1日,从区外迁入内蒙古的考生,同时符合本人具有内蒙古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且连续就读满2年,本人取得内蒙古户籍满2年。很显然,这是刚出台的“新政”,按照3年早知道的规定,这一在2013年出台的政策应当最早在2016年执行,不能当年出台当年执行。对此,当事人声称“我们的户口迁到内蒙古6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得到公安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通知不允许参加高考的告知文件。我们认为内蒙古教育厅剥夺了公民应有的权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政策仓促出台,立即执行,这还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问题则是,在执行政策时,存在不少漏洞。首先,内蒙古这所学校为何可给不在本校读书的学生挂学籍?假如严格执行学籍规定,不允许任何空挂学籍的做法,其父亲很难想办法给其在内蒙古学校挂学籍。据媒体报道,当地教育部门正在追查此事,而这本身是教育违规。其次,湖北的学校接受学生读书,为何不给学生建学籍档案?由于学籍可以挂在户籍地,同时可找另一校求学,这也给想获得更好教育者提供了运作空间。这从根本上暴露出我国学籍信息管理的严重问题——一个学生没在一个地区读书,可一直拥有学籍,而在另一个地区读书却没有学籍。

在笔者看来,我国要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对于治理高考移民这类问题,不能通过强化报名条件来治理。近年来,为打击高考移民,我国不少省市在高考报名时实行“户籍+学籍”双证制度——既要有当地的户籍,还要有当地求学的学籍。而且,不少省市还提出户籍和学籍的年限要求,导致户籍和学籍分离的学生在高考报名时遭遇没有地方可以报名的尴尬。多年前,在北京就曾上演这样的尴尬。针对这种尴尬,当时的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开放异地高考。2013年,全国已有多个省区开放异地高考。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看到实行公平高考的希望。但很多人也担心,开放异地高考会带来高考移民。

其实,遏制高考移民和推进异地高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既要遏制高考移民,又要开放异地高考,唯一的办法是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这就要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把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这把高考指标变为各省的蛋糕,由此产生地方高考利益——推进全国重点高校基于全国统一考试的自主招生。如果全国所有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名高考,以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这就把高考变为自由高考,根本不存在异地高考一说。

而在眼下,则有必要完善各地已经实行的异地高考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标准。推行以学籍报名为主的异地高考政策,是当前解决类似黄涛问题的有效途径——有户籍和学籍的学生在当地报名高考;其余的学生以学籍为主进行报考,在哪里求学,以哪里的学籍报名高考——这需要国家层面进一步推进各地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同时完善学籍信息管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异地高考的推进,学籍的管理显得更加重要。比如,如何确认学生在一地拥有连续学籍,会不会出现学籍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及早发现学籍空挂的问题,让黄涛及时回到本地求学,这一问题也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完善学籍信息管理体系,这不仅是政府规范办学的需要,也是保护每个受教育者权利的需要。这方面,我国要充分发挥今年1月联网通过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通过“一生一号”来跟踪每个学生的求学情况,保障每个学生公平的求学权利。

1 是什么绑住了理论型教师的腿

成为双师型教师,该从何入手?小周能想到的,就是拜托身边的熟人,推荐她去报社实习。

在一位有报社工作经历的老教师的推荐下,小周去了当地一家报社实习。报社的编辑、记者很和气,但是小周还是遭遇了“身份特殊”的尴尬。譬如,一位被拜拜指导小周的记者,一次都没带她出去采访。小周心里也很明白,像这样的“良心活儿”,对方并没有一定要履行的义务。

而在理工科教师眼中,像小周这样的遭遇甚至“不值一提”。企业,尤其是注重知识产权的企业,最怕大学本科教师来考察。

“大学老师抓了一把原料,回去就把配方研制出来,卖给其他企业,这该怎么办?”在一次南方调研中,一位模具、模具生产的企业老板对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广明直言不讳。

刘广明告诉记者,如今的企业欢迎学生、专科教师来实践学习,却对本科教师格外留心,“本科教师做科研出身,爱琢磨现象背后的规律,而专科教师、学生主要关注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由本科教师带队的社会实践团队中,教师通常只能作为“生活导师”,被企业婉拒上生产线。

这些遭遇无疑给有心人浇了一盆冷水。而实际上,尽管人们对大学教师要增强实践经验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也不难发现理论型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鼓励。

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院长刘羽指出,专利是大学教师职称评定的一项指标,但是在大学里专利能不能被企业推广并不重要,“因为在职称评定中只看专利的数量,不问专利的推广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校企合作积极性。

刘广明也表示,评价教师、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是以科研为导向。纵向课题是由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横向课题则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用于解决实际应用的课题。后者在大学里往往不算在科研范畴中,对评职称无益,这也使得大学教师缺少与企业互动的动力。

刘广明也表示,评价教师、教师的工资待遇都是以科研为导向。纵向课题是由国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横向课题则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用于解决实际应用的课题。后者在大学里往往不算在科研范畴中,对评职称无益,这也使得大学教师缺少与企业互动的动力。

2 全职引进企业人士郁闷了谁

理论型教师转型为双师型教师乏力,那么,从企业引进的全职教师,是否能够弥补缺憾、安心教学呢?

河南省某高校副教授付明(化名)曾经是建筑行业的高级工程师,引进大学后却连年不得志。

高级工程师对应的职称是副教授。如果仍在建筑行业,按照资历、经验,付明早该评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可由于“熬”不出学术论文,不符合评教授的资质,一直熬到退休他也没有享受到教授级待遇。

付明悔不当初。

付明的郁闷来自于没有被高校当作“人才”看待。进一步探究原因,则与高校未打通企业人士向大学教师转型路径有关。

刘广明表示,国内大学最初都按学术型院校设置,引进师资的入门条件之一就是学历(通常要求博士毕业)。虽说如今教育部门允许大学有人事聘用权,但引进的人才、规格都是由省人事厅控制,想要突破聘任条件必须层层打报告,一系列烦琐的手续甚至比原先的控制更加严格。

假设一名企业人士通过引进程序进入教师序列,随之而来的待遇问题又让他们无所适从。高校定工资、级别通常是按照职务、职称,而企业人士有可能没有职务、职称。“像高工、教授级高工这类‘宝贝’很难聘到,一旦他们全职入校教书,收入上也将比原来矮一大截。”刘广明说。

与此同时,考核他们的标准不再是工程业绩,而是SCI论文、专利。“学校希望他们继续发挥工程实践之长,可是为了晋升,他们就必须在原先的长学会发表高水平论文。”看到昔日的工程跟着高校的“指挥棒”走,刘羽很无奈。

那么,高校能否对这些“另辟蹊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拉平企业引进人员与本校教师的待遇,高校是可以操作的。只不过校长未必肯为了企业引进人员的利益,去得罪评价自己的教授们。“大学里都会不自觉地形成各个小派别、小群体,提高企业引进人员的待遇,第一个叫嚣的就是劳苦功高的教授们。”

刘广明说,考核他们的标准不再是工程业绩,而是SCI论文、专利。“学校希望他们继续发挥工程实践之长,可是为了晋升,他们就必须在原先的长学会发表高水平论文。”看到昔日的工程跟着高校的“指挥棒”走,刘羽很无奈。

专家观点

“双师型”建设之路应怎么走

三种类型的双师型教师,各有各的发展困惑,但究竟哪种更容易被高校采用,结论并不难得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三种类型的双师型教师,第一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型教师,仅仅只是通过企业学习获得感性认识;第二类只能是极少数人,毕竟大环境并不鼓励企业人士回校任教。“应该重点建设第三类,通过兼职教学的形式,加强与企业界人士的紧密合作。”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双师型教师理解得比较绝对,认为理论和实践两支教师队伍一定要放在学校里。”别敦荣说,“现实中更应树立共享的思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构建一支教学上的双师队伍,而不是人事上的双师队伍。”

在这个问题上,别敦荣认为,教育部门的政策应发挥正能量,积极引导高校向兼职企业教师的方向努力,而不是用政策误导高校,譬如高校转型过程中能否要资源,就看有没有或有几个双师型教师。另外,尽管高校无权力评价兼职企业教师,但可以以配备教学助理、奖励优秀企业导师等形式,鼓励企业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广明则建议,高校建立人才特区,形成对特殊人才的保护机制。大学的精力用于关系平衡上过多。如果大学校长从心底认可应用技术型大学模式,要吸纳、引进企业人员从教并非绝对办不到。

“总的来说,当前形成一种尊重应用人才

培养规律的环境比较重要。”刘广明说,而大环境的形成,企业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他介绍,德国尊重一线员工、企业、行业协会与高校形成了无缝对接——企业无条件接收师生学习、开展产学研合作,甚至师生可以在企业里接触到最前沿的生产应用。而国内企业普遍起步较晚,尚没有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在别敦荣看来,国内企业才刚刚开始注重自己的知识产权,重视技术和利益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欧洲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加健全,也使得它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有更宽广的胸怀。“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一问题具有阶段性的。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提高,社会、高校也可以有所作为。”

名词解释

“双师型”教师

1998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前身)在《面向21世纪深化职业教育的改革》中提出了职业学校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任务。

双师型教师目前尚无权威性的定义,但是“双师”的内涵包括了理论教学与指导学生实践两方面。本文中的双师型教师分为三类人群:参加实践学习的理论型教师、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全职教师、兼职性质的企业人员。

随着近年来社会需求的转变,即将转型为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以工程为主打的专业、院校中,培养双师型教师也成为了它们的大势所趋。

现场

咫尺或天涯:科幻与科技的对话

■本报记者 韩理

中国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研究员、神舟九号航天员刘旺大校、中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系统工程系教授程承旗……这些“大咖”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人文艺术想象与技术工程实践之间的跨界对话。

日前,北京大学第四期黄门对话以“科幻与科技:咫尺或天涯”为主题,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到场学生有的来自航天相关专业,希望一睹航天英雄风采;有的是“大刘”刘慈欣的忠实读者,特地背来了厚厚的一套《三体》。

业,希望一睹航天英雄风采;有的是“大刘”刘慈欣的忠实读者,特地背来了厚厚的一套《三体》。

掌声,掌声,还是掌声

黄门,古代称学校的门,代指学校。而黄门对话,顾名思义,就是名流专家济济一堂,以论坛和讲座的形式同莘莘学子交流,启迪思维,碰撞火花。这一对话活动虽由校方主办,却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学生的欢迎。

“从前,科幻仅仅躲在小说里。今天,科幻经科技的锻造而获生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似乎,科幻艺术给科技创新以强大动力,科技进步给科幻艺术以更佳的表现力。科幻与科技究竟有多少距离?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到天涯?”活动主办方撰写的文案紧扣主题、优美有力,早在活动预热期就被北京大学科幻协会等多个学生组织在微博平台上转发、传播。活动还未开始,现场已经座无虚席,不少同学靠墙而立。

开场时,主持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党委书记谭文长向大家一一介绍到场嘉宾,每个名字都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介绍到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时,掌声尤为热烈。大家的欢呼声还伴随着高高举起的手、相机,一时间,现场俨然是一位中国本土最具号召力的科幻作家的“粉丝”见面会。刘慈欣二次起身致意,引发的骚动才渐渐平息。

虽然入场券多数以校内领票的方式发放,但在对话后的提问环节,不难发现,听众不仅来自北大校内,还包括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同学。他们纷纷向刘慈欣转达了本校同学对他的喜爱,并向刘慈欣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也能到北航、清华等高校做客、与学生对话。

专业探讨,轻松互动

对话先后围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历程、科幻作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未来等话题展开。张柏楠、刘旺介绍说,经过对比研究,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选择飞船作为发展起点,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经过几十年的自主研究,我国已经拥有了比较独立的载人航天体系,这正是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体现。

关于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程承旗结合世界载人航天的历史,认为科幻对科学的进步提供了思路和支持。他说:“目前一线的基础理论研究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越来越具有科幻的色彩。”

刘慈欣也表示,科学需要实践检验,而科幻是可能性的文学。“科幻作家往往并不着迷于可能性很高的设定,而是更喜欢最不可能的那种可能,但最不可能的往往最终被实现了。”

事实上,“科学是翅膀而非禁锢。”刘慈欣提出科学知识为科幻的想象提供了依据和空间,这是神话等形式不可比拟的。“三体”系列小说的创作正是源于刘慈欣本人对于三体问题的兴趣。

张柏楠认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两条路径:向太空探索,为地球服务。对于后者,他提出,商业化的运营将为航天技术广泛进入民用领域提供机制保障。

此外,围绕载人航天事业未来的发展,对话嘉宾还探讨了“人类的未来是地球还是宇宙”这一哲学问题。尽管这一问题难以得出肯定的答案,但嘉宾们达成共识:“科学技术未到达的地方,人文艺术率先抵达。载人航天事业需要做技术与人文艺术的双重准备。”刘慈欣也向大家透露,他每天都会跑步10公里,希望等到自己有能力支付起太空旅行的那一天,“为普通人可能上太空作准备”。



黄门对话“科幻与科技:咫尺或天涯”现场